



春秋战国时期长城沿线游牧民族的地下世界*



韩建业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分布着大量游牧民族的墓葬,从东部的燕山、军都山,中部的岱海、鄂尔多斯高原,一直延伸到西部的陇山甚至河西走廊一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外国学者对墓葬出土的装饰有动物纹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北方式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进行收藏、著录,70年代以后田广金等开始对墓葬进行科学发掘和综合研究。但这些研究重点在随葬品方面,对墓葬本身少有整体性考虑,对其所包含的丧葬思想更缺乏关注。

巫鸿曾就马王堆汉墓提出两个方法论假说:其一,帛画等随葬品不是独立的‘艺术品’,而是整个墓葬的一部分;其二,墓葬不是现成的建筑,而是丧葬礼仪过程中的产物。这两个假设其实具有普遍意义。从这两个假设出发,本文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长城沿线游牧民族典型墓葬的空间层次结构和随葬品的空间分布位置及其功能,试图以此对这些游牧民族思想中“地下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所揭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本文对丧葬思想的研究有较大的推测成份。如果因此而能引起大家对早期墓葬所反映的丧葬思想研究的兴趣,就算达到了写作目的。

—

本文所谓典型墓葬,指保存好且规模大的墓葬。保存好才更能反映原貌,规模大才更能体现复杂的丧葬思想。

河北北部燕山和军都山一带的游牧民族遗存,被称为玉皇庙文化,以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为代表,为戎狄之属。玉皇庙墓地位于延庆盆地北缘的军都山南麓,发掘出的400座墓葬排列有一定秩序,绝大多数为东西向的土坑竖穴墓,葬俗大体一致,基本都

是单人仰身直肢葬,流行殉葬马、牛、羊、狗等家畜的头骨和肱骨,最常见的是狗牲。以保存完好的甲(A)类最高级大墓M18为例。该墓为圆角梯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6米、宽1.6~3.23米,深2.66米。从距墓口0.9米处开始,在南北两侧留出生土二层台,其地下结构主要可分为台内和台外两大层次(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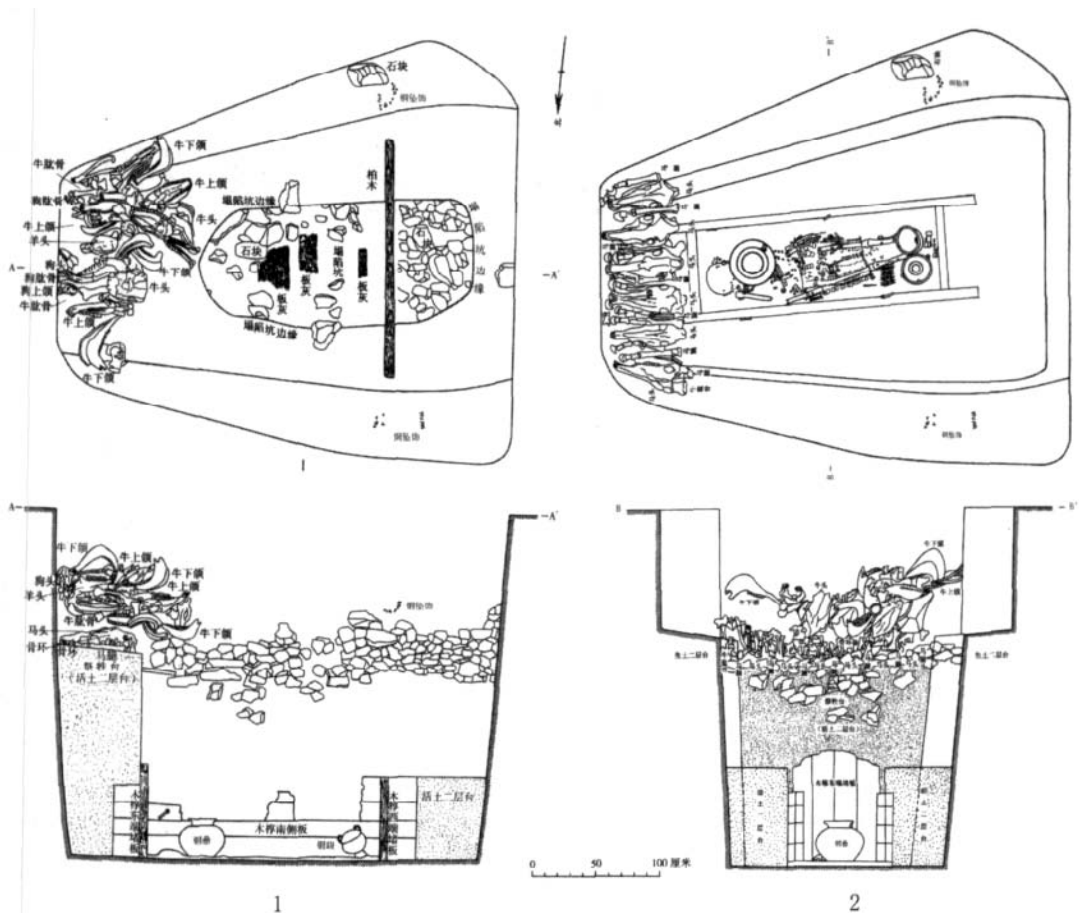
台内部分的核心,就是墓底正中的长方形木棺,长2.4米、宽0.8米³;木棺四周的空间均用土填充夯实而形成所谓熟土二层台。显然,木棺是为墓主人在台内留下的唯一“居住”空间。棺内为一40岁左右的男性墓主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棺内随葬物品达900余件(多数是装饰品),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随身物品,主要是墓主人的衣物装饰和随身武器工具。衣物装饰方面,除金丝耳环、金虎牌饰等外,最显著者是在胸膝之间有一个联珠形小铜扣组成的长方形圈子,其间有至少4列野猪形铜坠饰,以及数列绿松石珠。膝盖部位则有一排野猪形铜坠饰(图二)。这些物品应当曾经都装饰在一件有机质的裙类衣物上面。墓主人尸骨下面还铺垫毛皮和羊毛毡。另外,墓主人身体左侧尖端朝下的青铜短剑和削刀,或许就是其生前随身所佩。这类和墓主人联系最为紧密的物品,更像是其生前状态的自然延续,随葬的刻意人为成分最少。

第二类是非随身物品。墓主人身体四周的戈、镑、凿、针(锥)管具、锥等青铜武器和工具,胸腹部由铜镞、衔、节约和泡组成的两套马具,虽可能为其常用,但不见得生前随身携带。压在胸部的罍、足部的钹、敦、铎等青铜器,以及右胫骨外侧成排的青铜箭镞,更属有意放置。这类物品和墓主人的联系不如第一类紧密,随葬的刻意人为成分稍多。

如果仅有第一类随身物品随葬,木棺或许就只

* 本文得到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



图一 玉皇庙 M18 平、剖面图

1. 上层 2. 下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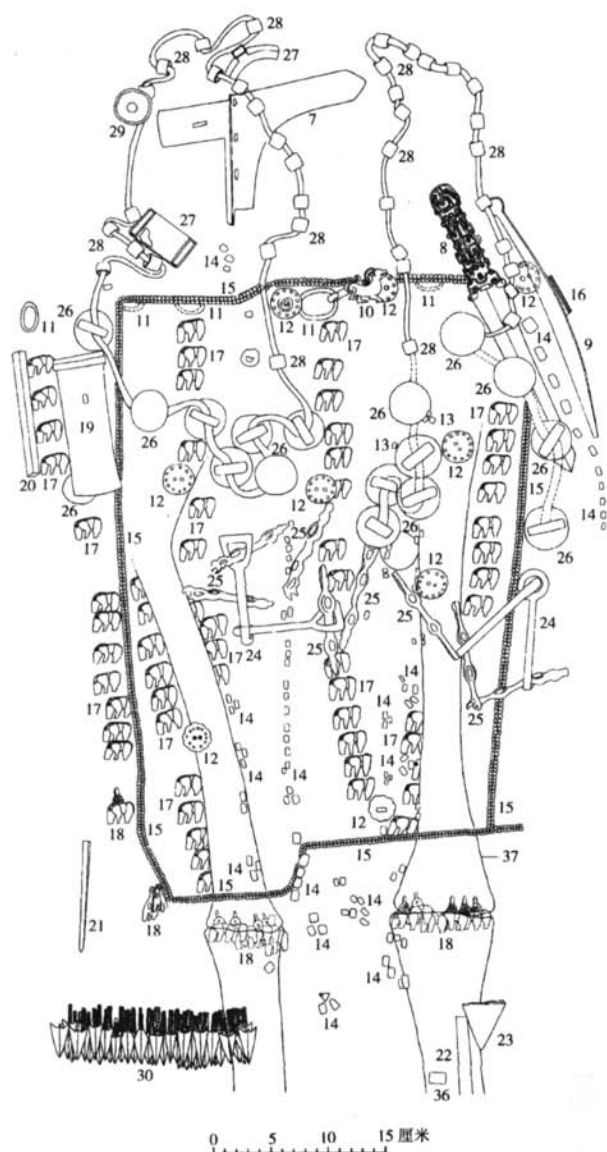
是墓主人在地下安眠的“床”。加上第二类非随身物品,木棺就显得更像“居室”,但这个“居室”过于狭隘,即使仅仅安眠着一个人,还要把一些车马器、容器等压在“人”的身上,这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可能发生。可见,木棺并非对现实“居室”的着意模仿。

台外部分的核心是殉牲。木棺东端(头端)的熟土二层台(高 1.6 米),高于棺顶和其他三面的熟土二层台(高 0.65 米~0.74 米),大致与东西两侧的生土二层台(高 1.76 米)平齐,其上摆放牲畜骨骼,应为特设的牲台。殉牲包括马头骨 16、马腿骨 16、牛头骨 2、牛腿骨 16、羊头骨 7、羊腿骨 5、狗头骨 4、狗腿骨 6。大致分上、中、下三层整齐有序地摆放,动物骨骼的吻部和蹄部均朝东(和墓主人头向一致):下层放马头 6、马腿 12,头在上而腿在下,1 个马头配 2 条马腿;马头附近还见有数件作为马具的铜环、骨环。中层放马头 10、马腿 6、牛腿骨 10,也是头上腿下,马腿和牛腿骨则相互交错排放。其余均在上层,

大致是狗骨在最前(最东),中间为羊骨,后面为牛骨。

下层的马骨以及马具,可能代表 6 匹可以驾驭的完整的马,不排除这些就是墓主人生前之爱马的可能性,也或许是其首领地位的一种礼遇规格。在《礼记》、《荀子》、《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六马”或“六驥”的说法。《逸周书·王会解》中更明确提到“天子车立马乘六”,逸礼《王度记》也说“天子驾六”。近年在洛阳东周王城车马坑中还明确发现六匹马驾一车的情况,大约正是“天子驾六”的实物遗存。看来在周代六马的确是最高规制。秦代尚六,“乘六马”,六马此后更成为皇帝专门规制,甚至汉代匈奴单于也“乘六羸(骡)”。玉皇庙 M18 应当是玉皇庙文化中最高级别的墓葬,受周人礼制影响而设象征权威的六马实属可能之举。

中层的殉牲头、腿(肱骨)难以配对,大概象征成群的牛、马,并不强调其具体数目。上层的殉牲摆放



图二 玉皇庙 M18 棺内遗物分布图(局部)

7.戈 8.短剑 9.带钩 11.环 12.扣 13.坠珠 14.珠 15.联珠形扣
16.长方形带饰 17.野猪形带饰 18.野猪形坠饰 19.铸 20.锥(针)管
具 21.锥 22.凿 23.砾石 24.銎 25.鏃 26.泡 27.节约 28.环箍
30.鏃 36.盒形器盖 37.盒形器(压在左股骨之下)(除 13、14 为绿松
石,23 为赤铁矿石外,余均为铜器)

有序,让人联想到牧犬引路、羊群居中、牛群列后的放牧情景。果真如此,那殉牲象征的就是永久伴随这位地下牧人领袖的畜群了。只是上、中、下三层还有象征空间上的更为细微的区别:下层的马和墓主人空间上的距离最近,相互关系可能最为密切;中层的牛、马群次之,而上层或许就是草原畜群的象征。有

趣的是,在与牲台同一高度的中西部填土中摆放大量石块,东西两侧还见有若干“人”字形铜坠饰,这就使得牲台这一高度空间延展开来,象征草原的意味更浓。另外,殉牲集中在墓主人头端,殉牲头向和墓主人头向多一致,或许是在强调其与墓主人的隶属关系。

台内“居室”和台外“草原”,构成玉皇庙 M18 地下两大象征空间层次;二者间以 0.9 米左右的填土隔开,大概是为了强调“居室”和“草原”之间的空间距离。

据所随葬周式青铜容器的形态特征, M18 的年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早,属于玉皇庙墓地最早的墓葬之一。和 M18 同样随葬青铜礼器、在牲台下层摆置 6 马的甲(A)类大墓,还有稍晚的 M250。不过该墓在墓穴足端(西段)三面留出生土二层台,使得牲台至生土二层台这一高度的“凸”字形“草原”空间更加突显,而且其上还发现 3 处红烧土面,夹杂木炭屑,应为墓祭遗迹。同属甲(A)类大墓的 M230 以陶器代替青铜礼器,虎形牌饰为铜质而非金质、殉牲中仅有 2 马,其级别应稍低于 M18 和 M250。

发掘报告将玉皇庙墓葬分成四等八级。随着级别的递减,墓葬结构渐次简单,随葬品和殉牲的种类和数量也依次变化,有的甚至没有殉牲和葬具。不过,大部分墓葬虽然没有生土二层台,但殉牲都在接近墓口的头端,与盛殓尸骨的棺都有较大的空间差距,内“居室”、外“草原”的象征结构仍有较为清楚地表现。可见这种内、外空间观念已是这些游牧民族的集体意识,并非上层人物特有,也不受性别影响。此外,大部分墓葬每墓都在头部随葬 1 件陶器,应当不仅是模仿“居室”实用器,而是还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玉皇庙墓葬除了少数可能具有标识性质的“墓顶石”,以及个别大墓地面上的可能属于墓祭遗迹的红烧土面外,缺乏享堂、坟丘、积石、石围等其他墓上设施。

这虽然不排除是后来破坏所致,但更可能原本如此。大概与这些游牧民族不很强调墓上设施的纪念性有关。《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除棺槨当为中原影响外,大墓尚金银而无封树正是匈奴本色。玉皇庙文化等春秋战国时期长城沿线的游牧民族文化,当为汉代匈奴

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①,无封树可能正是其古老传统。

二

内蒙古中南部的游牧民族遗存,可以称之为桃红巴拉文化^②,以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墓葬^③、包头西园墓葬^④和凉城毛庆沟墓葬^⑤为代表。

凉城毛庆沟墓地位于岱海盆地北缘、蛮汗山南麓,发掘出的67座游牧民族墓葬均为头东脚西,常见殉牲。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数都是宽1米、长2米左右的小型墓葬,最大者长度也只有2.8米。虽然缺乏玉皇庙M18那样的高等级墓葬,但葬俗和玉

皇庙文化类似,尤其墓葬的空间结构与玉皇庙中小型墓葬的情况大体一致:殉牲都在接近墓口的头端,与墓底尸骨所在有较大的空间差距。与玉皇庙墓地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1. 绝大多数墓葬都没有木棺类葬具,可能说明其“居室”观念不很强烈。或许称墓主人尸骨所在空间为地下“居处”更为合适。这与同一墓地流行木棺的农业文化墓葬形成鲜明对照。

2. 见有少量在墓主人手掌附近随葬羊肩胛骨的现象,可能为入殓时有意放置在墓主人的手中(图三)。这显然与填土上部的殉牲不同,或许具有某种特殊的宗教含义。

3. 少数墓葬有头瓮,瓮中放置1件陶器。这就扩展了墓室底部的功能,使其分割出一个类似储藏室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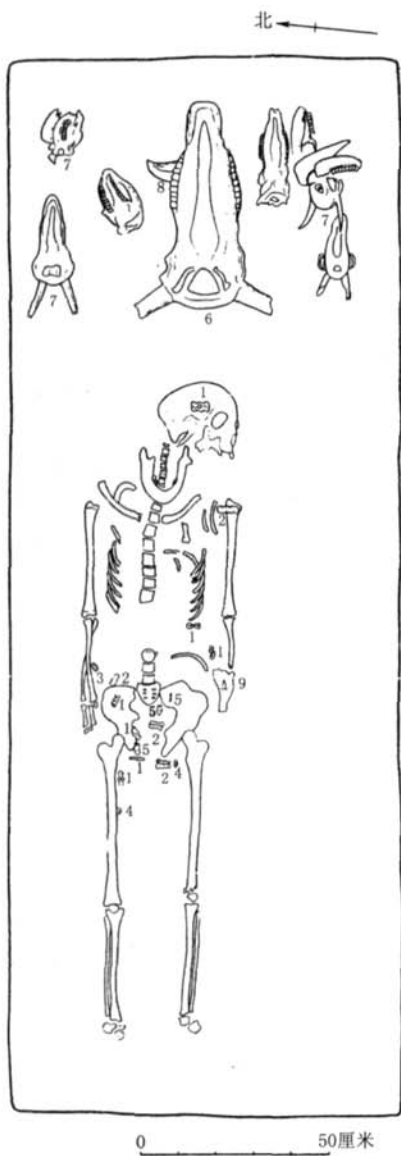
此外,还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异,如玉皇庙男性胸部着短裙、毛庆沟腰部系牌饰带,玉皇庙流行敷面葬俗而见于毛庆沟,玉皇庙殉动物肱骨、毛庆沟殉动物蹄骨等。不管怎样,毛庆沟游牧民族墓葬同样存在内、外不同层次的空间结构,外层空间可能仍象征草原,内层空间属地下“居处”。

桃红巴拉墓地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中部,以保存较好的M1和M2为例。二者的基本情况均与毛庆沟墓葬略同,特殊之处有二:

1. 有的殉牲靠近头端,有的则遍布整个墓坑填土上部,殉牲数量也明显偏多。比如M2是一幼儿墓葬,墓坑上口长1.75米、宽1.2米,最多相当于玉皇庙墓地的中型墓葬,却殉葬羊头骨42具、马头骨3具、牛头骨4具,还有若干牛蹄骨,殉牲数量比玉皇庙墓地的一般大墓还多(图四)。这可能是鄂尔多斯高原游牧民族牧场宏阔、牲群庞大的反映。此外,以一个幼儿的身份而有如此庞大的牲群,说明该社会存在比较明显的财产和权利的家族继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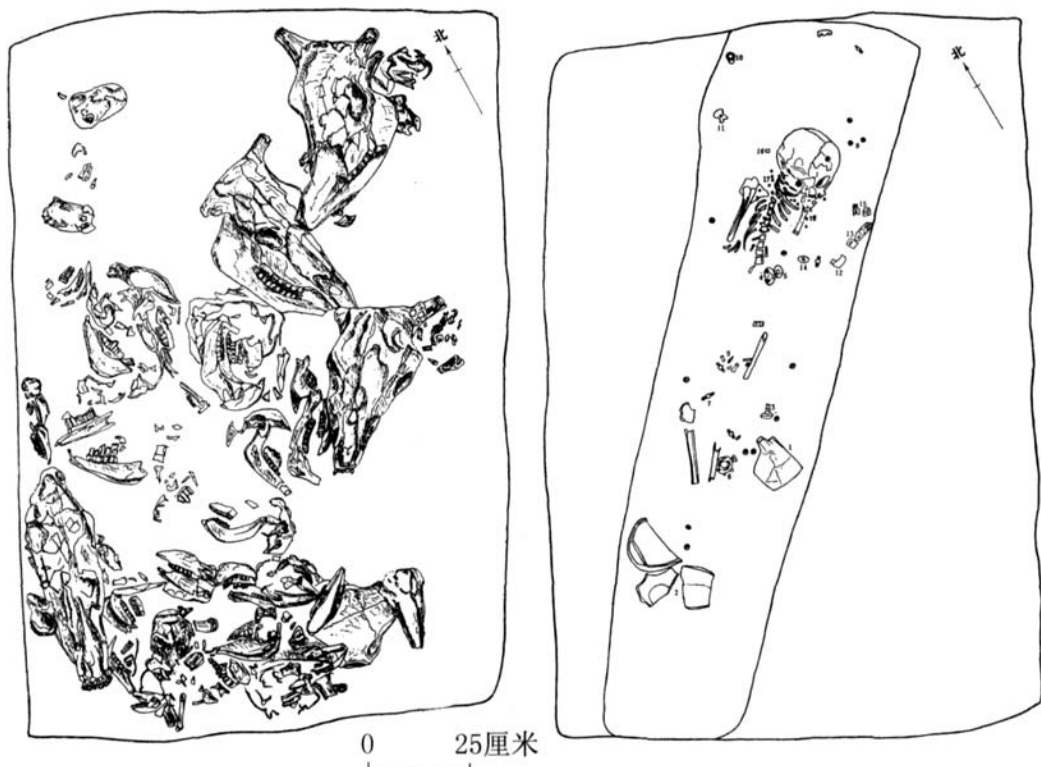
2. 有的马嘴中尚有马衔,马头两侧散有马面饰,或为墓主人生前乘马,如M1,很强调马具和马的密切关系。而玉皇庙墓地马具都置于墓主人身上,更多强调墓主人对马衔等重要马具的占有。

西园墓地位于大青山南麓,经发掘的5座墓葬均为横式偏洞室墓葬,这是其与桃红巴拉、毛庆沟、玉皇庙等处墓葬的最大不同。但仔细分析,发现其空间结构仍然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内洞室为放置尸骨的地下“居处”,外墓道底部略高于洞室底部而形成二层台,台上摆置殉牲。其空间象征意义应与前述竖穴墓没有什么两样。此外,墓葬洞室外殉牲有的靠



图三 毛庆沟 M2 平面图

1.铜双鸟纹牌饰 2.铜联珠状饰 3.铜管状饰 4.铜扣饰
5.铜兽头饰 6.牛头骨 7.羊头骨 8.牛蹄骨 9.羊肩胛骨



图四 桃红巴拉 M2 平面图

左:殉牲 右:1.石杯 2.陶罐 3.铜棍棒头 4、5.铜环 6.铜带扣 7.铜圆管状饰 8.铜扣饰 9.小铁刀
10.角器 11.骨蝴蝶状器 12、13、15.骨器 14.骨环 16.绿松石珠 17.石柱状珠 18.骨珠

近头端,有的遍布整个墓坑,洞室内有的还在头部随葬羊肩胛骨,与桃红巴拉墓葬情况相似,殉牲吻部均与墓主人头向一致,面向墓主人,强调其与墓主人的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M3 为一双人(均为女性)合葬墓,在流行单人葬的这些游牧民族墓葬当中显得颇为特别,其洞室外殉葬牛头 6 具、羊头 40 具,应当象征一个较大的牲群了(图五)。

三

宁夏中南部及甘肃中东部的游牧民族墓葬,以宁夏固原杨郎乡马庄墓葬^⑥、于家庄墓葬^⑦以及彭阳张街村墓葬^⑧为代表,被称之为杨郎文化^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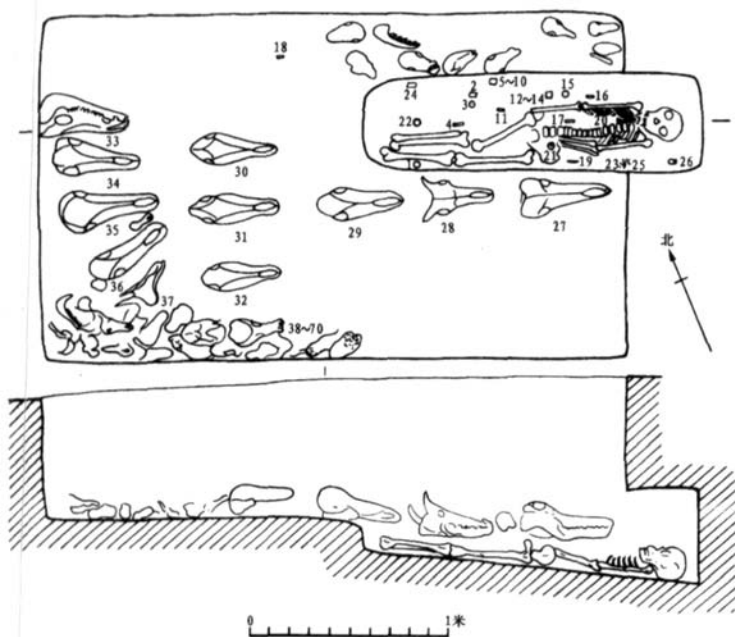
杨郎文化流行殉牲洞室墓,与包头西园的偏洞室墓葬类似。在墓道二层台或者其上的填土中,殉葬牛、马、羊的头和蹄骨,头吻部朝向墓室,以羊最多。多者如于家庄 M4 殉葬羊头骨 53、羊颌骨 130、牛头骨 2 具。且与玉皇庙墓葬一样,也是以牛、马等大牲畜骨骼为核心,羊骨居于次要位置。比如张街村 M3,在墓道中部从前到后分 5 排整齐摆放 2 具牛头骨(下有蹄骨 4 只)和 8 具马头骨(下有蹄骨 8 只),在墓道东北部和西南部杂乱摆放 32 具羊头骨(图六)。

或许象征作为主体的牛、马队伍,以及相对集中的两



图五 西园 M3 平面图

1.铜刀 2.铜斧 3、12.铜环 4、6.铜耳环 5、9.铜管形饰
7、8、10.铜扣饰 11.铜动物性饰牌



图六 张街 M3 平、剖面图

- 1、3、21.铜泡饰 2.变形鸟纹牌饰 4.骨针 5~10、12~14.铜带饰
11、16、17.铜管 15.环状铁器 18.铜杖头饰 19.铜刀
20、23、25.坠饰(玛瑙珠饰等) 22.铜环 24.砺石 26.陶罐
27、28.牛头骨 29~37.马头骨 38~70.羊头骨

个羊群。

特殊之处有三点：

1. 均为纵式(直线式)洞室墓,竖穴墓道宽大而洞室窄小,洞室多较浅而使入骨的下肢部分出露在墓道,洞室多里低外高,致使墓主人呈头低足高之状。突出强调象征性地下居处”的狭小和象征性草原的广大,有些类似玉皇庙 M18、M250 等大墓的情形。

2. 有的墓葬把殉牲置于墓室后半部,模糊了象征性的内、外空间区分,如张街村 M2。

3. 随葬品中见有车马等青铜器,象征墓主人对马车的拥有。

此外,偏南的庆阳袁家村墓地葬马坑与墓葬分开,马坑中还有各种车马器^⑩。这种葬马坑或许象征马厩而非草原,与中原传统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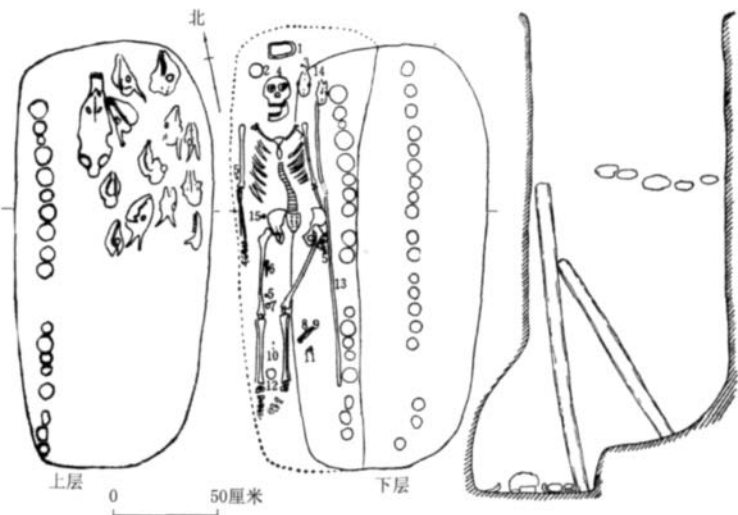
四

河西走廊中部的游牧民族墓葬,以永昌蛤蟆墩^⑪、西岗和柴湾岗墓葬为代表^⑫,属于沙井文化^⑬。流行偏洞室殉牲墓葬,普遍在墓底留有二层台,少数有两层二层台,洞室外殉牲靠近墓主人头端,吻部与墓主人头向一致,与包头西园墓葬最为相似。以蛤蟆墩 M15 为例,特殊之处有三(图七)：

1. 偏洞口以两层圆木封堵,其上都盖有茭苳草席,将内、外层空间严格区分开来。洞室内盛殓尸骨及随葬品,没有填土,墓道填土中共殉葬马蹄骨 1 具、羊头骨 20 具,有的头骨上还残留皮毛痕迹。

2. 墓主人头侧随葬羊头骨 2 具,显然与墓道填土中象征草原牲群的殉牲不同。从头骨附近还有桦皮圆木盒、木长方形盒等盛食器来看,这 2 具羊头骨应为供墓主人直接“食用”的祭享食品。

3. 洞室内人骨下垫白灰并铺茭苳草,有烧灼薰燎的火葬痕迹。白灰的纯洁,火的洗礼,让人想到这或许与葬礼中的圣洁仪式有关。其目的与聚聚焚烧



图七 蛤蟆墩 M15 平、剖面图

- 1.长方形木盒 2.桦皮圆木盒 3.石珠 4.铜泡(2个) 5.骨珠(3枚)
6.铜刀(带鞘) 7.圆形骨饰 8、9.弓弭(2对) 10.绿松石珠(2个) 11.骨链
12.圆木盒 13.长木条 14.羊头骨(2个) 15.铜泡

尸骨成灰的情况不同^②。

此外,西岗和柴湾岗墓葬流行在近墓口处瘞埋陶罐的现象,每墓1件,置于墓主人头部一端。作为容器的陶罐与墓主人头端对应,可能有祭享含义,但将其放置在与墓主人“居处”相隔一定距离的“草原”空间,与前述其他文化墓葬在墓主人头部放置陶罐的做法有所不同。

五

总体来看,在关于地下世界的构想方面,北方长城沿线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都试图建墓葬作为族人在地下的永久居所或者永久“家园”。但在墓葬空间结构安排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北方民族利用墓葬纵深空间的远近,来强调内层居处和外层“草原”的区分;中原民族利用墓葬平面空间的展开和多重棺椁,营造出院落、居室等不同层次的“阴宅”空间。这显然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北方民族流动性大,聚落稳定性差,居住设施简易,因此墓葬中的“居室”或“居处”颇为简单。草原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墓葬中也就特别强调象征草原的外层空间及其牲群的重要性。中原民族聚落稳定,庭院居室的大小和复杂性体现出清楚的等级观念,墓葬上就可能形成棺椁制度。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对人们丧葬理念的制约作用。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后,曾征求王玉冬博士、李梅田博士的意见并加以修改。

注释:

发掘者靳枫毅认为属山戎,林沄认为属狄人所建的代,陈平认为属北狄之无终戎。见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合刊。陈平:《略论“山戎文化”的族属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3期。

《晏子春秋·内篇》说:“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数,寡者五六”,可见戎狄养狗之盛。

该类木质葬具大小刚能容身,六面俱全,故称其为棺更为妥贴。《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发掘报告则称之为椁。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六马之离,必于四面之衢”。《荀子·劝学篇》云:“六马仰秣”,《修身篇》云:“六骥不致”,《议兵篇》云:“六马不和”。《吕氏春秋·忠廉篇》云:“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

关于逸礼《王度记》的这段内容,文献引用不

一。汉郑玄《驳五经异义》作“案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单于遂乘六羸,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

《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发掘报告推定其为春秋早期,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一书推定与其同时的M2为春秋中期(第74~76页),两书均承认M2的盘、匜、敦等青铜器与洛阳中州路M2415同类器很相似。洛阳中州路M2415的年代,原告定在春秋早期(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而《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定在春秋中期偏早(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当以后者为是。

据发掘报告,其中具有生土二层台者共37座,仅占总数的9.25%。

在《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称鄂尔多斯高原遗存为桃红巴拉文化,岱海地区遗存为毛庆沟文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530~5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荀子·大略》说:“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其实先秦时期火葬习俗时见于整个欧亚草原,不只氏羌独有。

① a.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b.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马王堆再思》,《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1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④ a.王国维:《鬼方昆夷獯鬻考》,《观堂集林》第十三卷,第583~606页,中华书局;b.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⑤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⑦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1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⑧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杨郎青铜

(下转第033页)

注释:

、 、 ② 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 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 ⑪、②③、②⑤、②⑥、②⑨、③① 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 、 ⑬、⑭、⑮、⑯、⑰、⑱、⑳、㉑ 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② 沈长云:《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文史哲》2005年第3期。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59年。

⑫ 方酉生:《夏王朝中心在伊洛和汾浍流域考析——兼与〈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一文商榷》,《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⑬ 方酉生:《禹居(都)阳城考辨》,《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⑭ 方酉生:《论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说——兼与〈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一文商榷》,《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论禹都阳城为颍川阳城——兼与〈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一文商榷》,《殷都学刊》2001年第4期。

⑮、⑳ 方酉生:《论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说——兼与〈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一文商榷》,《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㉑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6页,中华书

局,1959年。

㉒ 张之:《河亶甲居“相”地望考》,《安阳考释——殷邲安阳考证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

㉓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第22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㉔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册,1935年。

㉕ 郑杰祥:《夏史初探》,第1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㉖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第53页,中华书局,1998年。

㉗ a.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b.许顺湛:《寻找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c.顾万发:《“启居黄台之丘”及相关问题考证》,《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

㉘ 周书灿:《〈穆天子传〉“启居黄台之丘”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

㉙ 江林昌:《来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㉚ 许顺湛:《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启示》,《2000年濮阳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会议讨论论文集》(一),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

㉛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㉜、㉝ 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迁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钰淦)

(上接第073页)

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① a.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县于家庄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b.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2002年第8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541~5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④ 刘得桢、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⑤ a.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4年第7期;b.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c.蒲朝斌:《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

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 安特生著、乐森瑛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1925年;J.G.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Eastern Antiquities No.15, Stockholm, 1943.